

清代 盛京城

佟悦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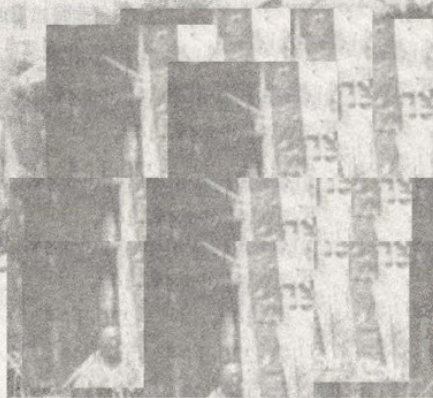


清代

盛京城

佟悦一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 佟悦 20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盛京城 / 佟悦著. —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80722-769-4

I. 清… II. 佟… III. 沈阳市 — 地方史 — 清代
IV. K293.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9390 号

出版发行者: 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50mm × 226mm

印 张: 14³/₄

字 数: 220 千字

印 数: 1-3000

出版时间: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吴昕阳

技术编辑: 杨 雪

封面设计: 杜 江

责任校对: 王晓秋

定 价: 28.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345

邮购热线: 024-23284335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前言

盛京，是我们要介绍的这座城市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名称。这个阶段，严格算起来是从公元 1634 年到 1906 年，即从清太宗时正式为都城命名，到光绪末年撤销“陪都”建制；或许可以将其两端再略为延展一些，算成 1625 年到 1912 年，也就是从后金汗国定都于此到清朝被民国取代。在此之前的辽、金、元、明历朝，这里被称作“沈州”和“沈阳”，在此之后的近百年间，作为中国东北地区第一重镇，它虽一度被叫做“奉天省城”或“奉天市”，但直至现在的大部分时间里，“沈阳”仍然是其正式的城市名称。

简而言之，这里要为读者描述的，是从满族人占领至清帝退位近三百年间的沈阳城。这个阶段在城市历史中所占时间并非很长，但却对这座城市近世以至当代的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把一座城市的盛衰联系得更广泛一些，那么“盛京”时代的沈阳，不仅对同期中国东北乃至华夏神州产生过深远影响，也曾经是东北亚各主要民族进行过不同形式表演的重要舞台。

无论对于过去和现在，沈阳城的“盛京”阶段都十分重要。毕竟这里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国的奠基处、大清王朝的陪都城和“满洲”族称的命名处，也是近四百年来的中国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令人稍感遗憾的是，清代有关这个城市的文字记载，远不如中国其他一些名城那样丰富多彩，以至很难对其城市发展的每个阶段和社会各层面都作出细致生动的描绘。本书主要想讲述的，更多的是关于这个城市自身的事情，包括当时的城池建筑、市井风貌和居民生活诸方面。由于近些年的现代化改造导致旧有城市面貌改变，以往居住在这里的“知情者”们，又很少有兴趣记录他们身边那些司空见惯的事情，作者不得





不凭借有限的文字记录和历史图照，参照多年调查访问搜集到的实证资料，努力恢复盛京城真实面貌，并借此帮助读者形成对百年前城市及其居民更加清晰的印象。

“盛京”是17世纪二三十年代至20世纪初期的一座城市，从有“城”算起，在此之前她已历经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但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定都沈阳开始，其城市地位、城郭面貌、居民构成等许多方面都发生了迥异于前代的重要变化，虽然坐落位置没有改变，但几乎是开始了一座新城市的历史。《清代盛京城》就是向读者介绍这座“新城市”在清朝入关前后的重建与发展。尽管主要笔墨都用来渲染盛京城的方方面面，但作者却很难将其写成严格意义上的“城市断代史”。主要原因应该是盛京以及其他古代中国城市，不似欧洲那种典型城市或城邦，是由市民阶级及其推选的市政机构组成、可以“呼吸自由空气”的所在，而是专制皇权下“朝廷命官”等各类“臣民”生活的地方，更多地带有地方行政中心色彩，却缺乏富有个性的城市精神。所以我们的叙述，不得不重视当时中国社会大环境对这里的影响，而又更多地通过城市规划的自成特色、居民成分的与众不同、行政管理的特殊体系等方面，来展现这座城市三百年间历史的主要方面。实际上，这些变化与大清王朝的盛衰兴亡密切相关，城居人民的主观意志却很少对其产生影响。

本书第一章简要叙述远古至明代中期沈阳城的历史沿革；第二、三章是满族人建立的后金地方政权占领并定都于此的过程；第四、五、六、七章介绍清入关后盛京作为陪都的基本体制、城市概貌和居民结构；第八、九、十、十一章是盛京城商业、宗教、风俗、教育各方面的具体描述；最后三章则试图说明其从封建王朝“陪都”向近代城市的转化。为便于形象地了解旧日城市面貌，作者从多方搜集到的历史图照中精选出百余幅，分别插入相关文字叙述当中，以期读者能够对当年的盛京城留下更为清晰的印象。

目 录

前 言	001
一、从两千年前说起	001
考古学者的发现	001
不知名的古城	002
辽国新都市	004
从沈州到沈阳	005
二、满洲人的重建	006
再度崛起的女真人	006
辽沈新家园	007
选定“形胜之地”	008
四年前的激战	009
定鼎新都	012
天眷盛京——穆克敦	013
三、汗国都城	019
亦兵亦民的百姓	019
关东汗王宫	021
八旗的广场	025
新春盛典	028
贵族府邸	032
新王朝的孕育	037
四、“陪都”新制	041
不容忽视的故里	041
旧都遗制	043





“奉天”和“承德”	047
兼管旗民的将军	050
特殊的朝拜	053
五、关东第一城	056
外圆内方“八卦城”	056
洋人的记述	060
城内街路	062
遍布城区的胡同	066
汗王陵和功臣墓	072
旧皇宫的扩建	077
祭祖还乡的皇帝们	088
六、土著人和外乡人	094
老满洲和新满洲	094
蒙古人和锡伯人	098
成分复杂的“汉军”	100
民籍人和客籍人	103
七、没有“父母官”的城市	106
有职无权的县官	106
“佐领”的城区	108
城市警察——步营司	111
八、行、市与店铺	114
城厢的“行”和“市”	114
商业店铺	120
酒席楼和大车店	128
烟馆、妓院和戏园	135
买卖银钱的生意	138
九、城内外的庙宇	143
幸存的古寺	143
皇家喇嘛庙	147
佛寺道观与仙家洞府	151
天地坛和堂子庙	156

清真寺与洋教堂	160
十、市井关东风	164
婚嫁礼仪	164
挂起来的摇篮	166
“旗装”和“民装”	167
岁时节令	169
小河沿踏青	172
盛京庙会	175
子弟书和八角鼓	179
十一、孔子庙和洋学堂	184
读书人的圣殿	184
沈阳书院（萃升书院）	186
八旗贵族学堂	189
近代学堂	193
十二、“小鬼子”和“老毛子”	197
甲午战争的冲击	197
反洋教的义和团	199
“奉天大会战”	201
十三、铁路与新城区	204
附属地和商埠地	204
切断“龙脉”的铁轨	207
城区内的“马路”	209
奉天公园	213
十四、从改制到易代	215
设省和改制	215
鼠疫和防疫大会	217
“革命党”和“保安会”	220
主要参考书目	225
后记	227



一、从两千年前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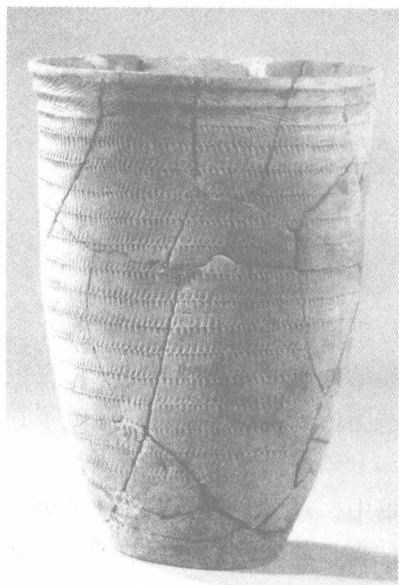
在“盛京”这个名称出现之前，位于这方土地上的城市虽然并不像后来那样声名显赫，但却坐落在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人文区域。也正是出于这方面的原因，才更具备被塑造为历史名城的契机，成就了它日后的辉煌。

考古学者的发现 在中国古代史书中，对沈阳乃至东北地区远古史的记述十分模糊。两千年间那些居住在长城以内的汉族学者们，既没有认真研究过这里上古时期的民族和部落，更不可能科学地探寻史前人类在这里的遗迹，只是按照当时记述远古历史的传统做法，把这里含混地划为古代中国北方某个州的属地，便算是有了交代。直到现代考古学传入之后，才使我们对这一地区史前人类活动有了真正了解。

公元1973年，居住在沈阳北郊的中学教师刘先生，拿着他几年来在住宅附近捡到的一些奇怪陶片，来到沈阳市考古工作队，想请教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有什么价值。因为他捡到这些陶片的地方，不久后就可能建起一座新学校，如果那些东西是有价值的文物，将会永远地压在新建的校舍之下。

正在探索沈阳地区史前人类活动历史的考古人员，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民间考古爱好者。在仔细研究了他带来的陶片后，请他作向导来到了发现陶片的地方。那片区域位于沈阳市区北部，南面紧邻一条古河道，北面则是一道东西走向的土岗，十分适合原始人类居住。在那周围，考古人员又捡到了一些类似的陶片。经过认真分析，专家们兴奋地认为，这些陶片很可能是沈阳城及周边尚未发现过的新石器时代陶器残片。于是，从1974年春天开始，地方考古部门分几次对这处遗迹进行发掘，结果是相当令人兴奋的。在几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出土了两个时期的许多文物：其中离地表较近者是距今约一千年的辽金时





新乐遗址出土的陶罐

期遗存，这在本地区并不稀罕；令人惊喜的发现是在距地表较深的文化层中，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陶器、石器 etc 文物，与刘先生拾到的陶片为同一时代制品。考古人员将其中一些标本送到北京研究机构进行碳 14 同位素年代测定，结论是这个新石器时代原始遗存距今约 6800~7200 年，这是沈阳地区迄今发现的最早人类活动遗迹。因为出土地在当时新乐电工厂所属区域内，所以便按照考古学的惯例，命名为“新乐文化”。现在，埋藏在地下数千年的原始社会房屋遗址和许多珍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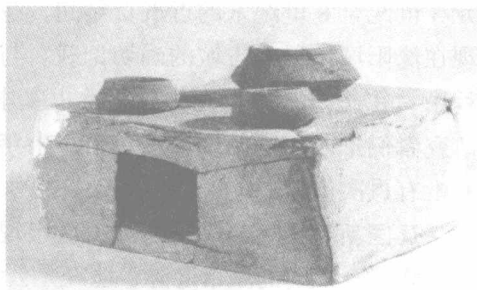
文物已陆续重见天日，这里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遗址旁建立的博物馆也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

不知名的古城 “新乐”遗址的发现虽然带给沈阳的人们一阵惊喜，但冷静下来之后才发现，这并不是古代沈阳城市的起源，而只不过是数千年前擦城而过的一缕“文明之光”而已。要真正找到城市源头，必须在距沈阳旧城最近处发现更古老的上古城市遗迹，而且与后来的城市具有明显沿革关联及更替关系。

于是，考古学家们又开始了新的探寻。

其实，至晚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人们就已在沈阳旧城区范围相继发现了一些战国、汉代墓葬和居住遗址，而且其分布也很有规律，即旧城的外城部分多出土墓葬和随葬器物，内城部分的发现则以房屋遗址和日常生活用品为主。这个现象似乎在提示人们，这座远古城市就在沈阳明清以来旧城的下面！但是，对其是否存在“城”和城的范围界定，必须要找到最早的城墙才可以下最后的结论。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人们更希望能够尽快地找到沈阳城市的“根”。考古专家在不懈地努力着，沈阳市民们在期盼和等待着。

1992 年春天，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因为处于旧城中心地带的中街和故宫之间，要新建一座大型商场（当时称“东亚商业广场”），在拆旧房建地基的同时，考古工作者对这一地区进行了重点发掘，结果是令人惊喜的。在距地表 7 米多深的地方，发现了一段数十米长、东西走向的城墙，其西侧一端又向南折入位于明清旧城中心的沈阳故宫院内。在城墙的同一文化层中，还出土了战国和西汉时代的陶器、货币和建筑材料等文物。结合以前在旧城区的发现，有考古学者肯定地认为，他们发现的就是上古古城北城墙的西侧一段。



沈阳出土的汉代陶灶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这座古城的名称和建筑年代。由于历年出土的早期文化遗存都没有能够证明这座城池名称的实物，人们只好根据文献的记载去分析推测。经过反复认真研究，学者们终于得出了相对一致的意见：沈阳地下的这座古城，应是《汉书·地理志》中提到的辽东郡 18 个县中的候城县，其始建年代应该是在战国的燕昭王后期，即公元前 300 年左右。因为那时处于今河北一带的燕国（都城在今河北省邯郸市），为了抵御北方和东方骑射民族的侵扰，派大将秦开率领军队向北方和东方拓土开疆，在今中国东北地区南部建立了辽东郡和辽西郡（郡城的所在地分别为今辽宁省辽阳市、朝阳市），并在郡以下陆续设县。位于今沈阳市内的古城，距辽东郡的中心辽阳只有几十公里，其北面不远即是燕国用来防御骑射民族的长城。所以这座城作为辽阳北部屏障应早于汉代之前即已出现，其名称到底是不是候城尚待进一步查考和证明，不过沈阳市区早在两千多年前即有古城，却是被考古发掘证明的事实。

东汉末年中原战乱频仍，偏处一隅的东北地区也失去了旧日的正常秩序。大约在汉光帝年间，活动在东部和北部的高句丽族不断袭扰沈阳一带，并放火烧毁了候城县。此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即公





元3世纪至8世纪末的近五百年间，在各种历史记载中都找不到有关现在沈阳城位置上古城的确切记载。与之相应的是，多年考古发掘过程中，在沈阳城地下文化层里，也基本找不到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研究者们推断，其原因应该是东汉末年这里的古城被毁后，数百年间并没有再次重建。

辽国新都市 当这一地区再次出现文献中有确切记载并有地上地下文物遗存证明的城市之际，已经是公元10世纪初期。这时，生活在今蒙古草原东部的契丹族迅速兴起壮大后，很快就将其势力扩展到今山西、河北及辽宁省等地，建立了辽国。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位的公元926年，契丹王朝把从河北三河、蓟县等地掳来的汉人安置在这里，新建了“沈州”城。

值得注意的是，沈州城选址与这里原有古城几乎一致，或者更准确一点说，它是以汉代以前古城为中心建造的。形成这种状况并非巧合，据推测会有两种可能：一是当时古城的遗迹尚在，使建新城的人省去了选址的麻烦；另一种可能是这里的古城被毁后，在某一时期又重新恢复，到辽代初年仍可继续使用，契丹人只是将它改换了一个新的名称而已。



崇寿寺辽塔

无论如何，沈阳古城的历史从此开始了新的篇章。沈州毫无疑问是后来沈阳城的前身，这与对“候城”名称的推断大不一样，因为许多古代文献和实物都可以确凿地证明。如至今仍矗立于沈阳塔湾的无垢净光舍利塔（建于辽重熙十三年，1044）出土石函记载，此塔位于“沈州城西北丰稔村”；20世纪50年代拆除的沈阳崇寿寺塔（建于辽乾统七年，1107）出土石碑则记载此塔位于“州北三歧道侧寺前”，

所记位置与沈阳旧城的方位完全相符。记载那一时期历史的《辽史》《金史》等诸多文献中，也都有许多可以印证这一结论的记载。以后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和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继续沿用沈州这个名称。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也曾遭受过战乱破坏，但自沈州建立后，它的城池却未再像以前那样被长时间废弃，始终保持着清晰的沿革轨迹。

从沈州到沈阳 在元朝中期的顺帝年间，由于很多高丽国人被征服，需要安置在辽东地区，政府决定成立一个特别机构对他们进行管理，于是在沈州和辽阳管辖区域内，统一组建了“沈阳路总管高丽军民万户府”。这里的“沈阳”，是“沈州”和“辽阳”各取一字的合称。后来有人按照中国古代传统地名命名“山南水北谓之阳，山北水南谓之阴”规则，认为是因为沈州城位于沈水（后来称浑河）之北才改称沈阳的，这或许是较晚的一种说法。因为最早把沈阳与行政区划连在一起称呼“沈阳路”的“总管高丽军民万户府”官署并不设在沈州，而是设在位于沈水之南百余里的辽阳，直至元代后期才迁到沈州城来。不过从那时起，“沈阳”的名称便和这座城市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因为明朝取代元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后，并没有再使用沈州的旧名称，而是采用元代晚期的名称“沈阳”作为这里的地名，称作“沈阳中卫”城。

但是，住在沈阳的明朝汉族人，似乎很快就面临着与东汉时代类似的困境。这座城市向东和向北各约 100 公里以外的地方，是与他们有着不同生活方式的古老骑射民族——女真族和蒙古族活动的区域。尽管明朝初年时沈阳中卫指挥使闵忠曾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重新修筑城池，把原有的夯土城加高加厚，增砌城楼、垛口等设施，改建为防御能力更强的砖石城；两百多年后的嘉靖二十四年（1545），政府又下令把沈阳城四座城门之一的北门安定门重新增厚加固，并改名为“镇边门”，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从根本上减轻这座城市及所在地区面临的威胁。明朝末年，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改朝换代的过程终于从这里开始了。



二、满洲人的重建



明朝末年，一个重新崛起的民族在沈阳城东方不远的群山中日渐兴盛，不久以后其政权的中心便迁入了这座在当时并不十分重要的城市。随后，占领者对城市进行了重新规划和建设，并花费更多的精力去改造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文化风俗。20年后，当他们从这座都城迁出的时候，这个民族的皇帝已经开始成为全中国的新主人。这个城市也因此以新名称“盛京”而闻名于世。

再度崛起的女真人 满族人的先世女真人，本是中国东北地区的土著民族，其渊源至晚也可以上溯至公元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以在白山黑水、山林原野中骑射狩猎著称的古老民族。

在古代的汉文典籍中，这个民族不断变化着名称，直到公元10世纪的辽代，才固定地被称为“女真”，并于12世纪初期在以今黑龙江省阿城县为中心的地区的建立了大金政权，几十年间便灭掉了契丹人的辽国和汉人的北宋，建立了统治黄河以北地区的地方政权。不过，这些猎人们的后代并未能在中原地区更长久地延续他们的统治。公元1234年，草原上兴起的蒙古人结束了金王朝的历史。

在13世纪到16世纪中叶的三百多年中，留在中原地区的大部分女真人同化于汉族之中，而在东北地区东部和北部，仍然有数以万计他们的同胞，像他们祖先一样过着骑马射猎生活。这个民族虽然仍如以前一样英勇剽悍，但由于内部四分五裂，各个部落和氏族之间为权势和利益争斗不已，难于形成统一的合力。而元朝和明朝的统治者，却十分乐于使这个民族处于分裂状态，以利对他们的控制和利用，甚至当女真的某一个部族渐趋强大时，中央或地方政府会公开支持和扶持他们的敌人，以削弱其势力，并且寻找借口派兵镇压具有强盛趋势的女真部落，借以保持他们能够采用羁縻政策，对幅员辽阔、物产丰

富的东北地区实行有效控制。

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初，又一次实现本民族统一强盛的机会，降临到建州女真部落的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头上。他终于没有错过！凭借外界条件提供的可能加上自己的勇敢、智慧和运气，经过 30 多年不懈努力，一个拥有数万铁骑，令明朝辽东官员闻风丧胆的女真汗国，在距沈阳城不到一百公里的赫图阿拉山城，虎视着西方的汉人居住区域。



努尔哈赤画像

辽沈新家园 在努尔哈赤于 1616 年重新竖起大金汗国旗帜的时候，这个女真族政权的统治区域，还没有越过元、明汉人与女真人在辽东地区的界限，即汉族人主要居住在今辽宁省抚顺、本溪、宽甸以西，开原以南的地区，其东部和北部是女真人的传统生活空间。但在 1619 年取得对明军“萨尔浒之战”决定性胜利之后，在局部地区形成战略优势的女真政权，向西进入辽东汉人居住区已经成为不可遏止的趋势。

在事先攻下抚顺、清河、铁岭、开原，扫清障碍后，天命六年（1621）三月，由世代生活在“边外”的女真人组成的八旗大军长驱直入，在短短十几天内就占领了辽东大部分地区，其中三月十三日攻克沈阳、二十一日攻克辽阳。四月初，努尔哈赤便下令把都城从赫图阿拉迁到辽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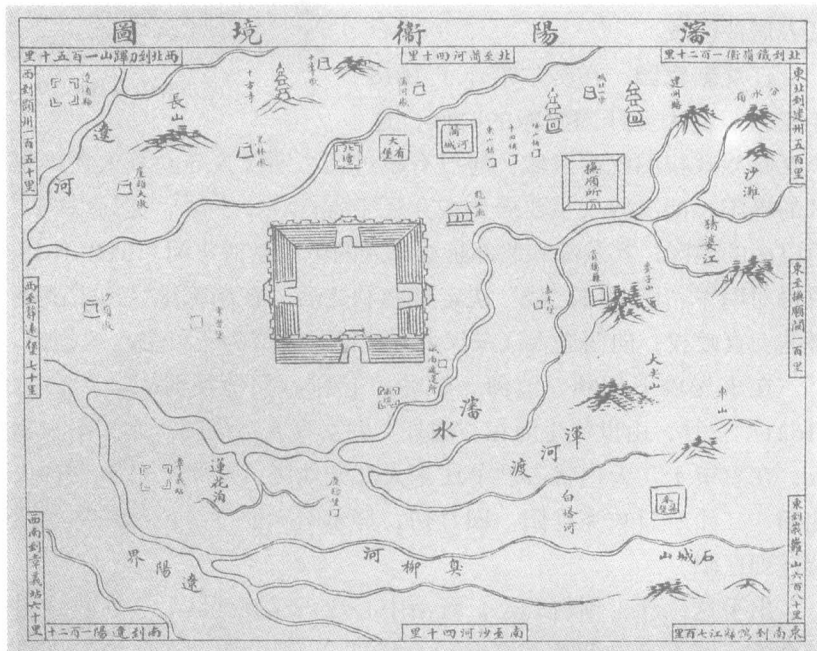
出乎这位汗王预料的是，统治中心迁入汉族地区后，对付这里的老百姓，甚至比几年前战胜分进合击的 20 多万明朝军队还要困难得多。因为辽阳在那以前的一千多年中始终是东北地区汉族居住区的中心，明朝建立后又作为辽东地区首府经营 200 多年，汉族人口众多，儒家文化影响根深蒂固。刚刚脱离山林狩猎生活来到这里的女真酋长们，虽然只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就攻占了这座东北最大的城市，但想把这里当做他们繁荣太平的国都却困难重重。不仅面临着沦为战俘和奴隶的汉族百姓们逃跑、投毒、暗杀等多种形式的反抗，而且在其





南部的金州、复州、盖州、镇江（今辽宁省丹东市）等处，还受到明朝军队的不时袭扰。为摆脱困境，努尔哈赤甚至在辽阳城外几公里处另建了一座独立的小城，命名为“东京城”，并在那儿修建了汗王宫殿和贝勒大臣府第，试图减少与汉族人的冲突，但局势仍不能明显好转。

选定“形胜之地” 在进入辽沈地区近四年的时候，后金国汗王努尔哈赤经过深思熟虑，于天命十年（1625）三月初三日正式下达一道谕旨，放弃刚刚建成的辽阳东京城，将汗国都城迁往浑河北岸的沈阳，并于当日起程北迁，第二天就住进了新都城沈阳。这一天，也成为沈阳城市地位转折的里程碑，“盛京城”的历史从此拉开了序幕。



明代沈阳城图

关于努尔哈赤决定迁都沈阳的原因，古今学者的看法并不一致。清朝官方修纂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记载着努尔哈赤对部下贝勒大臣们解释这一决定所说的一段话：

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沈阳浑河通苏苏

河，于苏苏河源头处伐木顺流而下，材木不可胜用。出游打猎，山近兽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吾筹虑已定，故欲迁都。

这段话中列举了迁都沈阳对实现日后进取目标的益处，似乎非常突出地体现了努尔哈赤的远见卓识、雄才大略。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上述记载是在迁都沈阳获得成功后留下的历史记录。根据当时档案整理而成的最可靠的史料《满文老档》中，并没有记录汗王在迁都时所作的这番高瞻远瞩的宏论。因此，后来的许多历史学家怀疑这段话是清太宗时期甚至清朝入关后修撰《清太祖实录》时添加进去的。

还有研究者，在考察过一些当时明朝人记载和满文档案记录后，得出更令人惊讶的结论：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并非像通常所说是为了推进开疆拓土的大业，反倒是为了更方便地退回辽东山区的老巢。证据之一是当时辽阳及以南地区汉人的反抗和明军的袭扰，使努尔哈赤不得不准备放弃对这些地方的占领，明朝人记载中说他已下令把掠获的财物运回赫图阿拉，并准备把被征服地区的汉人也带回去做奴隶。《满文老档》中也曾记载，辽阳汉人官员在迁都前写信给明朝官员，不想随汗王迁都沈阳，并请求得到保护。另外，沈阳的地理位置除了有利于向西、北、南三个方向进攻之外，还有一个清代史书中没有明确提到的退守便利，如果真的在辽东汉族地区站不住脚，女真骑兵从这里只需用不到两天的时间，就可以退回随他们任意驰骋、而明朝军队却无计可施的抚顺以东山区腹地。如果此说成为事实，说不定中国1644年以后的历史都要重新改写。

然而，历史的进程并不理会假设。事实是，迁都沈阳后，68岁的开国汗王虽然在进攻宁远（今辽宁兴城）时遭遇到他征战40多年以来的第一次败绩，并在不久之后去世，但由于他的继位者的雄才大略，推行一系列有助于进一步发展的改革措施，加之明朝方面不仅无力组织有效反攻，反而在关键战役中接连失利，最终使迁都沈阳成为清朝开国史中一项承前启后的英明之举，这个城市则随之成为奠定一代伟业的历史名城。

四年前的激战 不管是被迫还是情愿，在天命十年（1625）三月初四日，后金汗国女真君臣们浩浩荡荡地进入了新都城沈阳。

比起他们刚刚离开的辽阳城而言，沈阳在此之前不仅从未享有过

